

Fig. I. dictum. Hemisphaerium polare arcticum. Fig. II. Hemisphaerium polare antarcticum. Fig. III. Hemisphaerium Sphaerae sphaera pro hominibus secundum. Fig. IV. pars operaria in terris cum triangulis Norimbergensis.

全球经济治理

结构变化与我国应对战略研究

张宇燕 等著

积极参与践行全球治理
贡献完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路径，即以国家利益为支点，以经贸合作为基础，以经济外交为手段，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抓手，以新议题为引领，以能力建设为保障，以人类大同为愿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全球经济治理

结构变化与我国应对战略研究

张宇燕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化与我国应对战略研究 / 张宇燕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 - 7 - 5203 - 1926 - 3

I. ①全… II. ①张… III. ①世界经济—经济治理—研究

IV. ①F1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23835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约编辑 周枕戈

责任校对 石春梅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55

字 数 845 千字

定 价 1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总论 全球治理与中国 张宇燕(1)

第一篇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化及应对战略研究

主持人：黄薇

前言 (23)

第一章 全球治理的内涵 熊爱宗(25)

第一节 全球治理的定义 (25)

第二节 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 (31)

第三节 为什么会产生全球治理 (39)

第二章 全球经济治理的界定 朱丹丹(46)

第一节 全球经济治理的行为体 (46)

第二节 全球经济治理的运行机制 (75)

第三节 全球经济治理的重点领域 (84)

第三章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历史演变 刘玮(92)

第一节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 (92)

第二节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变迁 (95)

第三节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的演变模式 (104)

第四节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趋势 (113)

目 录

第四章 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迁的动力 刘 玮 (134)

- 第一节 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三大矛盾 (134)
- 第二节 权力重组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迁 (140)
- 第三节 理念变革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迁 (150)
- 第四节 国内政治转型与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变迁 (155)

第五章 全球经济治理的变革方向 丁 工 (162)

- 第一节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民主化 (162)
- 第二节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利益包容 (169)
- 第三节 应对全球问题的有效措施 (174)

第二篇 国际金融治理与应对战略研究

主持人：高海红

前言 (191)

第一章 国际金融治理演变与

改革总论 高海红 熊爱宗 (193)

- 第一节 国际金融治理的概念和框架 (193)
- 第二节 全球经济治理理念的演进 (199)
- 第三节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性 (203)
- 第四节 国际金融治理改革要点 (210)
- 第五节 结论 (225)

第二章 国际金融治理演变的

影响因素 高海红 肖立晨 熊爱宗 (227)

- 第一节 国际经济实力和治理格局的变化 (227)
- 第二节 金融危机与全球流动性管理 (235)
- 第三节 国际金融监管体系演变和影响因素 (241)
- 第四节 结论 (247)

第三章 美国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 治理的挑战	肖立晟 熊爱宗	(248)
第一节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与挑战		(248)
第二节 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与挑战		(256)
第三节 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缺陷和挑战		(261)
第四节 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缺陷		(272)
第五节 结论		(277)
第四章 国际金融治理演变趋势	熊爱宗 肖立晟	(280)
第一节 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方向		(280)
第二节 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改革方向		(284)
第三节 国际金融治理机制的改革方向		(291)
第四节 结论		(297)
第五章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应对策略	熊爱宗	(299)
第一节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定位与目标		(299)
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 SWOT 分析		(304)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应对策略		(319)
第四节 中国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应对建议		(324)
第五节 结论		(333)
第三篇 国际贸易和投资治理进展与应对策略研究		
主持人：姚枝仲		
前言		(339)
第一章 国际贸易与投资的发展历程	姚枝仲 徐唯燊	(342)
第一节 国际贸易的发展历程		(342)
第二节 国际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		(351)

目 录

第二章 主要的国际贸易治理平台和机构	高凌云(358)
第一节 GATT 与贸易治理	(358)
第二节 WTO 与贸易治理	(364)
第三节 区域一体化与贸易治理	(373)
第四节 G20 与贸易治理	(376)
第三章 国际贸易治理领域	倪月菊 东 艳(386)
第一节 已签署协议中的贸易规则	(386)
第二节 TPP、TTIP 与 TISA 在贸易治理方面的特点	(389)
第三节 服务贸易规则的发展	(392)
第四章 国际投资治理主体	韩 冰(413)
第一节 国家政府与国际投资治理	(413)
第二节 非国家行为体与国际投资治理	(414)
第三节 新兴投资治理主体	(421)
第五章 国际投资治理领域	韩 冰(424)
第一节 国际投资治理的主要内容	(424)
第二节 国际投资治理规则	(429)
第六章 中国更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政策建议	高凌云(449)
第一节 中国视角的全球贸易治理机制合理有效化	(449)
第二节 中国参与全球贸易治理的举措	(451)
第七章 中国更好参与国际投资治理的战略考虑	韩 冰(459)
第一节 关于国际投资治理未来方向的主要观点	(459)
第二节 全球性多边投资协定谈判前瞻	(461)
第三节 中国推动 G20 机制参与全球投资治理	(462)
第四节 前景展望	(466)

第四篇 国际气候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治理及应对战略研究

主持人：田慧芳

前言 (471)

第一章 国际气候治理的理论与范式 田慧芳 (474)

- 第一节 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 (474)
- 第二节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性 (478)
- 第三节 国际气候治理的概念与目标 (484)
- 第四节 国际气候治理的价值规范 (485)
- 第五节 国际气候治理的核心要素 (487)
- 第六节 国际气候治理的模式 (489)
- 第七节 国际气候治理的参与主体 (489)

第二章 国际气候治理的制度演进 田慧芳 杜国辉 (493)

- 第一节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国际气候制度演进 (493)
- 第二节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下的气候目标 (506)
- 第三节 多边贸易框架下的气候变化问题 (525)
- 第四节 二十国集团与国际气候治理 (529)

第三章 国际气候治理的实施机制 杜国辉 田慧芳 (533)

- 第一节 减排机制 (533)
- 第二节 技术机制 (544)
- 第三节 资金机制 (557)

第四章 国际气候治理效果评估 田慧芳 石晓军 (565)

- 第一节 国际气候治理的有效性评估 (565)
- 第二节 国际气候治理的公平性评估 (576)
- 第三节 “国家自主贡献”目标的力度评估 (578)
- 第四节 国际气候治理的未来发展趋势 (579)

第五章 中国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战略选择 田慧芳 (586)

- 第一节 客观认识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地位 (586)
第二节 有重点分阶段推进中国的低碳转型 (590)
第三节 建设性维护好当前的国际气候治理体系 (595)
第四节 有针对性地深化国际气候务实合作 (598)

第五篇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演变、发展及应对战略研究

主持人：孙 杰

前言 (607)

第一章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

- 历史演进** 孙 杰 魏 强 杨盼盼 (614)

- 第一节 世界经济格局、秩序的演变 (615)
第二节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历史演进 (630)
第三节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事实演变及评述 (645)

第二章 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的溢出效应研究 杨盼盼 (673)

- 第一节 基于 GVC 和增加值贸易的文献综述 (675)
第二节 全球价值链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溢出效应：
对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的扩展 (677)
第三节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宏观经济政策溢出
效应分析 (693)

第三章 G20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三大关键议题：

- 一体化、失衡和溢出** 李远芳 刘仕国 (705)

- 第一节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全球再平衡分析 (705)
第二节 发达经济体量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
基于 GVAR 模型的分析 (715)
第三节 发达经济体财政整顿：基于 WIOT 的分析 (746)

目 录

第四节 对跨国公司征税的国际协调	(786)
第四章 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的 战略选择 孙 杰 魏 强(798)	
第一节 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的现状与挑战	(798)
第二节 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的 SWOT 分析	(808)
第三节 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的应对战略暨结论	(821)
参考文献	(824)

总论 全球治理与中国

全球治理是近年来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内频繁出现的词汇。全球治理出现的宏大背景，首先是全球问题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深入日趋凸显。作为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与过程的全球治理，其日益受到世人关注的另一个重要背景，是形形色色的全球问题只有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才能得到解决或缓解。问题本身的全球性质和问题解决的全球性质，尤其是全球博弈的主要参与方都在力求通过处理全球问题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业已推动国际问题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和许多学科的成长历程类似，在成熟的或被广为认可的新研究范式出现之前，全球治理研究的最佳途径便是借助现有的分析框架与概念体系对相关重大领域或议题进行分析，比如全球货币金融治理或国际贸易投资治理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随着全球治理这个篮子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庞杂，对全球治理研究的理论化或形式化的要求便出现了，对其所涵盖范围的界定要求亦会出现。全球治理研究理论化的一个思路，是将全球治理视为各博弈者通过集体行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或俱乐部产品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搭建起一套逻辑架构，以期处理种类众多的全球议题。此外，全球治理研究中的案例分析也有很大的挖掘空间。对某个具体议题或领域进行全面深入的描述与剖析，并据此提出真知灼见，同样能够为全球治理研究理论大厦的建设做出杰出贡献。

一 历史回顾

总体上看，人类目前所处的时代是全球化的时代。这里所说的全球化，主要指的是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相互关联性不断提升和细

化，以及广泛破除约束要素跨国流动的藩篱，推动或加速相互关联性提升进程。全球化由来已久，于今尤甚。约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全球的各个角落，充斥着资产阶级对产品市场不断扩张的需求。它必然到处安家筑巢，到处建立联系。”经典作家们在当时不仅看到了今天人们称之为经济全球化的种种现象，还揭示了现象背后的本质，即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血腥味的或明火执仗式的对外扩张。丛林法则下的竞争有时会导致两败俱伤，通常的情况是无法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故约束恶性竞争的贸易与资本流动规则——如帝国主义国家间的一些双边或诸边协定——应运而生。这些国际协定或条约可被视为全球治理的雏形。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断了由帝国主义列强推动的全球化进程，进而也使那些松散的、参与国寥寥、涉及领域有限的全球治理雏形荡然无存。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主要工业国大都奉行了以邻为壑的贸易政策。支离破碎的世界不需要全球治理，处于战争准备期的欧洲大国更是无暇关注全球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其造成的人类浩劫，终于让人们认识到和平的至关重要性，也让人们感受到迅速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活的紧迫性。这便是世界主要国家（除轴心国外）代表于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人类历史上首次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的大背景。在这次会议上不仅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而且还为随后确立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世界和平机制做了铺垫。

紧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而来的“冷战”将世界分割成“西方”和“东方”。以美国和苏联为首，在历史征程中刚刚上路的全球治理随即被两个平行且对抗的治理体系所替代。北约和华约，欧共体和经互会，美元区和卢布区，不一而足。尽管冷战期间存在的是一种平行且对立的“分割式全球治理”形态，但在这一历史阶段内全球治理的层次、规模和领域均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联合国作为全球治理主要平台的地位得以确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功能得以加强，它们的成员数不断扩大，特别是成员国的分量也随即加重（如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所处理的议题亦日益增多。鉴于此，我们将“冷战”时期



称之为全球治理体系的建立阶段：全球治理的整体架构已经搭建起来，尽管其功能的发挥总是或多或少地受到东西两大对抗阵营的掣肘。

“冷战”的结束标志着世界迈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东西方的区分与对立随着1989年柏林墙倒塌而成为往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一时间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主导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第一次有机会顺势构建一个经济更加一体化的世界。对新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担忧消退后，人们开始热衷于谈论如何收获与利用和平红利，尤其是谈论如何通过破除贸易投资壁垒来扩大市场规模并享受随之而来的“得自贸易的收益”。1995年关贸总协定（GATT）升级为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及中国于2001年加入WTO，可被视为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全球治理加强的典型例证。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利益，西方还有一个不那么明显但却是更大的野心，那就是用对自己更为有利的国际规则容纳并整合冷战前后加入由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国家，比如中国和俄罗斯及东欧中亚国家。在此，全球治理的“工具性”显现出来。

与其说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开启了全球治理的一个新时代，不如说它延续抑或强化了全球治理的进程与功能。尽管2004年形成的“巴塞尔协议Ⅱ”与2010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Ⅲ”在银行监管政策倾向上背道而驰，但就应对全球金融风险的制度建设而言，两者毫无二致。因金融危机而升格为首脑会议的二十国集团（G20）例会，是全球治理得以强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冷战”后发生的大国间力量对比持续变化，诸如气候变化与恐怖主义等全球问题日趋严峻，柏林墙倒塌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引起的负面后果（如收入差距扩大），近30年来科技进步特别是网络技术跃升与普及导致的各种全球挑战（如网络安全与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等等，都不同程度地把世人的注意力汇集到全球治理之上。美国特朗普政府因减缩其全球义务而引发的批评与担忧，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世人对全球治理的深切关注。

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肇始于1971年重返联合国。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总体受制于“不是东风

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冷战”格局，对美苏主导的两个平行国际体系持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直至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中国才开始正式步入全球舞台。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随着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以及国际形势的整体缓和，中国开始有限地参与国际机制。由于刚刚重返国际社会，因此这个时期中国主要以学习和适应国际体系或规则为特点，虽然也参加各类国际机制的会议、谈判、讨论，但是尚未真正融入其中，对于会议所讨论的议题、治理机制的规制等问题既没有多少话语权，也相对缺乏参与意识。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全球情势的变化，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广度和深度均大幅提升。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的作为不仅对亚洲诸国应对困境走出危机起到了积极作用，还展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参与区域和全球治理的自信心和责任心。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整体实力稳步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态度变得更加积极主动。2001年成功加入WTO，成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的一个里程碑。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把G20推到了全球治理的风口浪尖上。鉴于G20俨然成为全球治理的最主要的平台，中国自然地成为其最不可或缺也最活跃的成员之一。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从而为推动和优化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动能。2014年中国倡议创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可以被看成是至少与加入WTO具有同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从相当意义上讲，“一带一路”倡议与亚投行的创立，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中国成功地向世界传递了中国应对全球经济困境的发展理念和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争取更多话语权和规则制定权的诉求。2017年1月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对全球经济治理存在的问题做出进一步的精辟阐述：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代表性和包容性很不够；贸易和投资规则未能跟上新形势，机制封闭化、规则碎片化十分突出；全球金融市场需要增强抗风险能力，而全球金融治理机制未能适应新需求，难以有效化解国际金融市场频繁动

荡、资产泡沫积聚等问题；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紧迫性越来越突出，国际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全球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才能为全球经济提供有力保障。随后，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主席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首次系统阐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方案，勾勒出全球治理的长远愿景。

二 问题与逻辑

大约半个世纪前，哈佛大学教授托马斯·谢林出版了一本书，题目为《冲突的战略》，其核心观点之一是：潜在博弈者参与博弈以及如何博弈，皆起因于存在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为了说明共同利益和冲突利益并存，谢林在书中讨论了这样一个例子：两个人分享一百美元，条件是他们各自写下的期望数额之和必须小于或等于一百美元，否则两人分文都得不到。双方只有合作，方可得到特定数额的美元，表明两人之间有共同利益；在具体分配上你多得的便是我少得的，显示出两者之间存在冲突利益。共同利益与冲突利益并存，显示出人类所处的一种普遍境况：即使你是一个自身利益最大化者，兼顾博弈对手的利益往往才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共同利益与冲突利益并存不仅对个人如此，对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函数的主权国家而言同样如此。和平共处、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包括恐怖主义和洗钱在内的跨国犯罪、公正且开放的贸易投资体系、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等全球问题，无一不事关全人类福祉。这些全球问题的解决又远远超出某个或某些国家的能力范围，从而使得广泛的国际合作成为必需。每一个国家都成为利益攸关方，就意味着各国之间存在着共同利益。与此同时，和平的实现、气候变化问题的应对、开放贸易体系的构建、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稳定的维持，等等，均不是免费午餐，而是要付出成本的。一旦涉及成本分摊，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冲突便开始显现，进而激烈的讨价还价在所难免。

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上述全球问题的解决途径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提供之性质。考虑到维持和平环境与遏制气候变化这类全球公共产品所具有的非排他性，也就是说任何国家或个人都可以免费享

用，故各国无形中就都受到了一种激励，那就是尽量让别国承担提供公共产品的成本，同时努力让自己成为搭便车者。由此而来的结果之一，就是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具体可以表现为战争爆发或战争威胁升级，二氧化碳不受限制地大量排放，最终使全人类的福祉受到损害。为了说明这种现象，人们创造了一系列概念或理论，比如说集体行动难题，或曰囚徒困境，或曰市场失灵，或曰公地悲剧，或曰合成谬误。

日益严峻且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是全球性的，问题的解决也必须通过各国的合作来实现。解决这些问题的通常办法之一是建立统一且具有权威的世界政府，并使其像主权国家的政府一样，通过强制性税收取资源并以此为基础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然而在目前的条件下成立世界政府并不可行。为了解决高度复杂的全球问题，人们只好另辟蹊径。作为缺位的世界政府的替代品，全球治理开始登上世界舞台。在此，全球治理指的是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为解决各种全球问题而确立的自我实施制度之总和，这些制度建立在各利益攸关方通过谈判而达成的共识之上，而共识就本质而言无非是各行为体权衡共同利益与冲突利益后的均衡解。

全球问题形形色色，可以开列出一个长长的单子来。某一特定的全球问题对不同行为体的利益攸关程度异甚多，典型的事例便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海洋国家和内陆国家之意义迥然不同。各行为体之间在规模或谈判能力上差别巨大，同样会深刻影响它们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与广度。各行为体内部的权力结构和决策机制各有特点，社会凝聚力和稳定性亦有高下之分。许多诸如富可敌国的巨型跨国公司或能够一呼百应的宗教团体，其利益诉求或价值取向，在国际舞台上亦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切大致解释了如下现象：全球治理形式千姿百态，功效参差不齐，空白或不足多见，达成普遍共识并形成集体行动困难重重。

说到集体行动，就不能不提及谢林的学生和后来的同事曼瑟·奥尔森。在《冲突的战略》面世后的第五年，奥尔森出版了经由谢林指导的博士论文《集体行动的逻辑》，并在书中深化且发展了谢林的一些想法，其中颇具见地的命题可概述如下：共同利益只是形成集体

行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形成集体行动的充分条件则有二，其一是博弈者数量较少，其二是存在所谓“选择性激励”。这里，选择性激励包含相互关联的两层意思：一是博弈者参与集体行动可获得比不参与更高的预期收益；二是博弈者不参与集体行动可能会面临更高的机会成本甚至惩罚。而参与博弈的人数少则强化了选择性激励，因为这时每个博弈者从集体行动产出中得到的相对份额就会增大；同时每人对集体行动产品所做贡献更容易被识别，从而减少搭便车行为。人数少时达成共识和最终形成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也更低。

全球治理的目标在于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除了全球公共产品因全球治理市场失灵而导致供应不足之外，我们还看到了某些全球治理产品的充足或过度提供，比如带有偏袒性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其发生机理完全可以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得到说明。在激励不足且不存在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基于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少数有意识、有能力利益攸关度高的博弈者便会形成小规模集体行动，积极地参与提供那些能够给自己带来净收益或能够最小化自身损失的“公共产品”。一旦受到特定选择性激励驱动而形成的狭隘利益集团取得支配地位，那么由此产生的全球治理便会是非中性的或偏袒性的。通过利用非中性全球公共产品，其主导者们甚至会不惜牺牲大多数利益攸关方的利益来增进自身利益。表现为国际制度或秩序的全球公共产品，在此实际上扮演着实现特定利益集团目标之手段的角色。

考虑到形成全球集体行动极其困难，特别是考虑到世界本质上是一个垄断竞争市场，故绝大多数涉及全球治理的集体行动，都属于“小规模”集体行动。其中，“二十国集团”就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由地区主要博弈者倡导的区域治理层出不穷则是另一类现象的例子。由此引出的问题，便是激励和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就是全球治理讨论中人们通常所说的有效性和代表性相互权衡的另一种表述。能否处理好这对紧张关系是对人类的一项挑战。能否成功应对这一挑战，取决于所有博弈者，尤其是主要博弈者的远见、智慧、胸怀和胆识。这里，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颇有用武之地。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最高境界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而是中庸之道，是在确立规则的谈判过程中顾及其他利益攸关方的感受。